

(←上接B1版)

梁清濂说：“他们当然不敢说，也不好意思地说。这几大名牌的行李都用卡车拉回家。裘盛戎回到家里，当着一家老小打开箱子——天哪！美国奶粉、的确凉衬衫、塑料杯、塑料花，一摞一摞的童装，还有成箱的三五牌香港……裘盛戎的六个闺女三个小子，高兴得又跳又叫。裘盛戎手腕上戴着二十一钻、双日历新表。把洋货收拾停当，他打开一盒三五烟，点着后深吸一口，说——一晃十几年没见啦！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章诒和，这情况他们在会上没说吧？”

回家讲给父亲听，父亲大笑，说：“还是资本主义好吧？”

渐渐地，我和她的接触更加频繁。我们同住一个寝室，还是上下床，我住上铺，她睡下铺。后来，我发现梁清濂经常不在寝室过夜。

一天，身着全新浅灰色西服的她，在我耳边低语：“我结婚了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我又愣住了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说这话时，她的脸上绽放着笑容。

“那男人是谁？”

“叫冯夏雄。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他的爸爸，你一定知道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冯雪峰，也是个右派。”

婚后的梁清濂干脆就不住集体宿舍了。一天下午，我躺在床上看书。突然有人站在院子里叫：“章诒和。”

抬头一看，是她！黑色开司米毛衣，白衬衫，西服裤子，精神抖擞，容光焕发，好一个新婚后的幸福女人。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身边的男人：身材中等，胖瘦适度，五官也端正。梁清濂指了指我，对他说：“这就是我说过的章伯钧女儿。”我想，这个男人想必是冯夏熊了。我翻身下床，走到院子里和他握手，就算相互认识了。

梁清濂可收拾的东西极为简单，也就是被褥、枕头、毛巾、脸盆、茶缸以及几件换洗衣服。冯夏熊麻利地把她的床上用品和衣服打成一个铺盖卷，把搪瓷盆和镜子等物装进随身带来的网兜，就算完事。两人朝“章伯钧女儿”摆摆手，扬长而去。

在课程里有一个“写作教程”，分量很重。内容就是让我们学着写戏，从写故事，写唱词，写片断，到写一折戏。有一次是老师让大家写一个故事。布置下来以后，我半晌下不了笔，不知该写什么。身边的事没什么可写的，忽然想起前不久安徽桐城老家的远房叔叔，偷偷跑到北京向父亲求救，说村里人都快饿死了，父亲留他在家住上几日。每次吃饭，叔叔端着白生生的大米饭就发愣。他返乡的那天，父亲送给他一些钱和粮票。他手握粮票，老泪纵横，父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。这件事，只要把原原本本写下来，就是一个故事。我走进书房跟父亲“请示”，父亲听了，正色道：“这事，你不能写。”

那我写啥？想来想去，就瞎编一个吧！瞎编什么呢？从前不是在香港住过吗？就写一个香港纯情女子因婚姻不幸而自尽的故事吧！为了显得真实可信，我把那香港女子说成是自己的表姐。表姐的恋爱经过许多的曲

折，由于长辈的刁难，加之男友的软弱，在一个深夜，她悬梁自尽了。我给自己瞎编的故事取名为“不夜城之夜”。一周后，我的这篇作品用图钉牢牢地钉在黑板上。授课老师发话了：“每个同学都要看！看看是好了还是坏了？看看有什么问题？”一听，就知道自己要倒霉。

心里发慌的我跑回家跟父亲说了。父亲笑道：“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？他们批判你，你听着就是，千万不要申辩和反驳。”

同学发言踊跃，一个接一个，我觉得自己不是大学生，是个小右派。班长的发言，让我记了一辈子。他说：“我来自东北农村，从来没见过资产阶级小姐。顶多在周而复始的《上海的早晨》里见过文字描述，现在见到了。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就站在我的面前。”我很想走过去给他一耳光，想到父亲的叮嘱，忍住了。整个下午都在批判我。唯一没有发言的人是梁清濂，而她是中共党员。

一直到毕业，我的每一天都有种明明自己没做错什么也在挨训的感觉。

后来，梁清濂生了个小孩；再后来，她离婚了；有关她的消息，总让你感到意外。

有一天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你知道汪曾祺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呀，西南联大的，沈从文的学生。”

于是，汪曾祺成为我俩的话题，经常是她听。从她那里我得知汪曾祺“划右”以后弄到张家口改造，落脚在一个农业研究所。离京城不远，比发配到的北大荒的聂绀弩算幸运多了。头两年参加劳动，主要在果园。后来就是画画，在三合板上用水粉画白菜、大葱。农科所要出版一套马铃薯图谱，任务交给汪曾祺。于是乎他每天到地里掐一把叶子和花，插在玻璃杯里照着画。画多少算多少，毫不费事，难怪他自己说：“我的工作实在是舒服透顶。”

1961年，汪曾祺回到北京，摘了右派帽子。当时北京市人事局局长是个戏迷，经过他的批准，把他安插在北京京剧院，任专职编剧，和梁清濂在一个办公室。他积极写剧本，也写了不少。

我问梁清濂说：“汪曾祺的剧本写得怎么样？”

“有才，懂戏，就是不太会写戏。”

“什么叫不太会写戏？”我问。

她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就是写出来的戏，没戏。”

“什么叫没戏？”

不知为什么，她气呼呼地说：“你连‘没戏’都不懂，还学写戏！”转身走了。

汪曾祺最成功的剧本要算接受上级指派，几个人共同改编的《芦荡火种》，他排位第一，出力最大。梁清濂告诉我：“虽然属于改编，汪曾祺是卯足了劲在做。那段唱词——‘垒砌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。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。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。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。人一走，茶就凉……’章诒和，我问你：除了他，还有谁能写出这样浅俗又诗意的唱词来？”显然，梁清濂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汪曾祺对戏班也很有感情，喜欢它的散淡与自在。这种旧情调也许只有北京京剧院才有，因为是由五大名牌制造出来的，且渗透到日常。我曾在四川省川剧团工作，那是一个由历届川剧学校优秀的毕业生组成，每天早上要开全团大会。不是批评这个，就是数落那个，搞得紧绷绷的。几个老艺人因为历史问题或同性恋问题，而备受折磨。这就与北京京剧院完全不同了。

有一天，梁清濂满怀激情地告诉我，自己写了一个剧本，叫《驿亭谣》，还说剧院正在排练，不久会公演。《驿亭谣》讲述的是一个古代故事：西汉武帝年间，河南大旱，万人绝粮。正在这时，富家子弟向驿丞的女儿贾天香求婚。天香为摆脱纠缠，提出谁能拯救饥民，就与谁成婚。天使官汲黯在天香的嬉笑怒骂下矫诏开仓，放粮救民，这样也就成就了汲黯与天香的姻缘。剧本编排有机趣，文字圆润且蕴涵诗意。当我读到唱词中的“枯木几抹照残阳，赤地千里对碧霄……”等句不知怎地联想到汪曾祺。

这个戏的首演在吉祥戏院，它坐落在王府井，是上座率最好的剧场。显然，北京京剧院是把《驿亭谣》作为重点剧目推出。首演那天，梁清濂给我打来的话，说：“你的戏票，我来不及寄了，咱们剧场门口见！找我或找汪曾祺都可以。”

一听这话，我更明白了：这个戏汪曾祺是帮了忙，他连戏票的事儿都管。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。没有看到梁清濂，只见汪曾祺站在剧场门口，手里捏着一些戏票。我赶忙凑到他跟前，自报家门。

他说：“我早就知道你。”说罢，把手里的几张票翻过来看，他递给我那张戏票背后有我的姓名。

进了剧场，我找到自己的座位：前排，靠边，还算不错。观剧过程中，我没看见梁清濂。汪曾祺坐在很靠后的位置，一副悠闲的样子。《驿亭谣》演出效果很好，后来成为北京京剧院的保留剧目。

几年后，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；再后来，因为恶毒攻击江青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，接着，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。也就是说，人家都活在人间，唯独我下了地狱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，社会形势大变，坐了十年大牢的我获得平反释放。1979年回到北京，全靠父亲的老友、也是老乡的黄镇（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）的帮助，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，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。业务荒疏了十余载，我一方面旁听研究生课程，一方面多看戏，尤其是看老戏。

一天，记得是看张君秋的《状元媒》，我在剧场门口见到梁清濂。两人大喊大叫，紧紧抱在一起。没上几句话，开戏的铃声响了。

梁清濂拍着我的肩膀，说：“请你到我家，咱们要好好聊聊！”

“好！”

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居住和工作，几个同学若要见个面也是不易，一约再约，一拖再拖，总算把时间定了下来，地点就在梁清濂的家。约定上午碰头，中午在她家吃一顿，每人带个菜就算“齐活”了，饭后各自散去。

我在电话里告诉梁清濂：“我要做两个菜，一个清蒸鲈鱼，一个香菇油菜。”

她说：“要我给你准备点什么吗？”

我说：“你什么都不用准备。”

我按地址找到她的居所，敲开家门，吓了一跳，只见满眼皆白：四面白墙，白色窗帘，桌子铺着白桌布，单人床覆盖着白床单，一个白色冰箱。如果说这个家还有其他颜色的话，那就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和一幅画了。走近一看，字是汪曾祺写的，画是汪曾祺画的。字的流畅，画的随意，让我觉得凡是与艺术沾边的，他都是手到擒来。

(下接第B3版→)